

云南大学

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邹应猛◎著

# 网络力与 东亚伙伴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

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邹应猛◎著

# 网络力与 东亚伙伴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络力与东亚伙伴外交 / 邹应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5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9706 - 6

I. ①网… II. ①邹…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东亚  
IV. ①D822. 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6167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马明  
特约编辑 李凯凯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超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315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郑永年

副主任委员：邢广程 朱成虎 肖 宪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
| 王逸舟 | 孔建勋 | 石源华 |
| 卢光盛 | 刘 稚 | 许利平 |
| 李一平 | 李明江 | 李晨阳 |
| 杨 恕 | 吴 磊 | 陈东晓 |
| 张景全 | 张振江 | 范祚军 |
| 胡仕胜 | 高祖贵 | 翟 崑 |
| 潘志平 |     |     |



##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林文勋

编委会副主任：杨泽宇 肖 宪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孔建勋 卢光盛 刘 稚  
毕世鸿 李晨阳 吴 磊  
翟 崑

## 总 序

近年来，全球局势急剧变化，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中国在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其外交政策是否会从防御转变为具有进攻性？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大国和国际秩序，甚至会单独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确，中国外交在转变。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新型大外交，我把它称为“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尤其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条腿为主要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即“一带一路”。“一个圈”则体现于中国的周边外交。这三者相互关联，互相影响。不难理解，其中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也是影响两条腿行走的关键。这是由中国本身特殊的地缘政治考量所决定的。首先，周边外交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全球谋篇布局的起点。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因此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克服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成为影响中国在亚洲崛起并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其次，周边外交是助推中国“一带一路”主体外交政策的关键之举。“一带一路”已确定为中国的主体外交政策，而围绕着“一带一路”的诸多方案意在推动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考量的是如何多做一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并让周边国家适应中国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并使之愿意合作，加强对中国的信任。无疑，这是对周边外交智慧与策略的极大考验。最后，周边外交也是中国解决中美对抗、中日对抗等大国关系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中国充分发挥周边外交效用，巩固与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周边国家的发展壮大，提升中国的向心力，将降低美日等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与

国家中的影响力，并化解美国在亚洲同盟与中国对抗的可能性与风险，促成周边国家自觉地对中国的 외교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

从近几年中国周边外交不断转型和升级来看，中国已经在客观上认识到了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性，并做出积极调整。不过，目前还没能拿出一个更为具体、系统的战略。不难观察到，中国在周边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乏方向，更缺乏行动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其中导致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周边外交研究的不足与相关智库建设的缺失，致使中国的周边外交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一直紧扣中国周边外交发展的新形势，在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特色定位，并在学术成果与外交实践上硕果颇丰，能为中国周边外交实践起到智力支撑与建言献策的重要作用。第一，在周边外交研究的基础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扎实稳固，发展迅速。该中心所依托的云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了相关研究。进入21世纪初，在东南亚、南亚等领域的研究开始发展与成熟，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自2010年起每年举办的西南论坛会议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高层次的学术性和政策性论坛。2014年申报成功的云南省高校新型智库“西南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中心更在中央、省级相关周边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在周边外交的研究定位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有着鲜明的特色。该中心以东南亚、南亚为研究主体，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等为重点研究方向，并具体围绕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安全合作、人文交流、南海问题、跨界民族、水资源合作、替代种植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创新。第三，在周边外交的实际推动工作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在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据了解，迄今为止该中心完成的多个应用性对策报告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采纳和认可，起到了很好的资政服务作用。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推出的《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系列与《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智库报告》等系列丛书正是基于中国周边外交新形势以及自身多年在该领域学术研究与实践考察的

深厚积淀之上。从周边外交理论研究方面来看，这两套丛书力求基于具体的区域范畴考察、细致的国别研究、详细的案例分析，来构建起一套有助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新型周边外交理论，并力求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合作机制、水资源合作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从周边外交的具体案例研究来看，丛书结合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实事求是的田野调查，以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人文合作、环境合作、边界冲突等为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客观独立的分析与思考。从对于国内外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究 with 对外实践外交工作的意义来看，丛书不仅将为国内相关研究同人提供借鉴，也将会在国际学界起到交流作用。与此同时，这两套丛书也将为中国周边外交实践工作的展开提供智力支撑与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

郑永年

2016年11月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谜题：东亚的伙伴关系网 .....          | (1)   |
| 第一节 引言 .....                   | (1)   |
| 第二节 本书的主题 .....                | (7)   |
| 第三节 伙伴关系及其争鸣 .....             | (9)   |
|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 .....              | (18)  |
| 第二章 国际关系网络 .....               | (22)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网络化 .....             | (22)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网络 .....               | (33)  |
| 第三节 权力与网络 .....                | (39)  |
| 小 结 .....                      | (51)  |
| 第三章 东亚国际关系网络 .....             | (53)  |
| 第一节 冷战时期东亚的轴辐安全体系 .....        | (53)  |
| 第二节 东亚国际关系的网络化 .....           | (60)  |
| 第三节 东亚面临的“威胁三角”问题 .....        | (66)  |
| 小 结 .....                      | (76)  |
| 第四章 国家的战略菜单：同盟、国际制度与伙伴关系 ..... | (79)  |
| 第一节 同盟、制度化合作与“不可能三角”困境 .....   | (79)  |
| 第二节 战略伙伴关系与威胁应对 .....          | (91)  |
| 第三节 网络力与伙伴关系网：一个分析框架 .....     | (101) |
| 小 结 .....                      | (111) |

|                                      |       |
|--------------------------------------|-------|
| 第五章 东盟的伙伴关系网 .....                   | (113) |
| 第一节 东亚网络中的东盟 .....                   | (113) |
| 第二节 东盟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             | (126) |
| 第三节 东盟的安全利益与伙伴关系网的构建 .....           | (138) |
| 第四节 东盟的“嵌入”策略：国际制度与东盟的<br>网络力 .....  | (152) |
| 小 结 .....                            | (166) |
| 第六章 日本的伙伴关系网 .....                   | (169) |
| 第一节 东亚网络中的日本 .....                   | (169) |
| 第二节 日本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             | (177) |
| 第三节 日本的安全利益与伙伴关系网的构建 .....           | (193) |
| 第四节 日本的“嵌入”策略：价值观外交与日本的<br>网络力 ..... | (211) |
| 小 结 .....                            | (223) |
| 第七章 美国在东亚的伙伴关系 .....                 | (225) |
| 第一节 轴辐安全体系及其在后冷战时代的挑战 .....          | (226) |
| 第二节 美国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             | (236) |
| 第三节 美国的安全利益与伙伴关系网的构建 .....           | (249) |
| 第四节 美国的“嵌入”策略：从“轴辐”到“蛛网” .....       | (266) |
| 小 结 .....                            | (279) |
| 第八章 结论 .....                         | (281) |
| 第一节 伙伴关系与东亚的多节点政治 .....              | (281) |
| 第二节 伙伴关系与国际关系研究 .....                | (293) |
| 参考文献 .....                           | (297) |
| 后 记 .....                            | (315) |

## 第一章

# 谜题：东亚的伙伴关系网

## 第一节 引言

2013年7月25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布建立越美“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伙伴关系为推动越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总体框架”（an overarching framework），并将政治外交、贸易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环境卫生、战争遗留问题、防务安全、保护人权、文化旅游等领域列为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sup>①</sup>会晤后奥巴马宣称，伙伴关系意味着美越两国关系“不断取得进展并得以巩固”，标志着美越关系走向成熟，并进入了新阶段。张晋创也强调，“鉴于过去18年双边关系取得的进展，现在是构建全面伙伴关系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不同领域关系的时候”<sup>②</sup>。此后美越双边高层互访频繁，关系取得了不少突破。2016年5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访越期间宣布将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2017年5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美期间双边签署了价值多达15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协议。2017年1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将越南作为其亚太之行的首站，并强调此次出访目的

---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President Truong Tan Sang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July 25,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7/25/joint-statement-president-barack-obama-united-states-america-and-preside>.

<sup>②</sup> 李博雅：《美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7月27日第11版。

是为了加强美越全面伙伴关系，使其“符合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sup>①</sup>

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越伙伴关系得到了政策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反映了美越双边关系的改善。观察者们指出了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等推动因素。其中，一些观点将中国作为参照对象，强调美越伙伴关系旨在通过相互借力，来“削弱”或者“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sup>②</sup>事实上，早在2008年越南就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中越双边关系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越南与美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前一个月即2013年6月，中越两国在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华期间还联合签署了推动伙伴关系深化的文件——《中越两国政府落实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17年1月，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期间，双方发布的《中越联合公报》重申了“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sup>③</sup>显然，美越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并没有阻碍中越关系的发展。将美越伙伴关系视为“制衡”中国的工具，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有学者对此提出警示，认为“关注美越合作无可厚非，但在解读中扯上中越关系，不免有恶意炒作之嫌，也未必符合事实”<sup>④</sup>。

事实上，自进入21世纪以来，伙伴关系已成了越南广泛采用的外交战略工具。除了中国和美国，越南还与俄罗斯（2001）、日本（2007）、印度（2007）、韩国（2009）、西班牙（2009）、英国（2010）、德国（2011）、意大利（2013）、新加坡（2013）、泰国（2013）、印度尼西亚

① 刘乐凯：《越战结束40载后，美越欲加强全面伙伴关系》，2017年11月10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796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7969)）。

② 罗会钧：《美越防务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3期；Murray Hiebert and Phuong Nguyen, *A New Era in U. S. -Vietnam Relations: Deepening Ties Two Decades after Normalization*, CSIS Report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 27, 2014; Alexander Vuving, “Why Trump Is Capitalizing on Obama’s U. S. -Vietnam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7, 2017.

③ 《中越联合公报》，2017年1月14日，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4/c\\_1120312428.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1/14/c_1120312428.htm)）。

④ 苏晓晖：《美越合作不能改变中越关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5月24日第1版。

(2013) 等 10 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2013 年越南总理阮晋勇在出席当年度的香格里拉论坛时, 明确表示越南希望与所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sup>①</sup>

环顾东亚, 越南并非特例。冷战结束至今, 中国已与全球 67 个国家、5 个区域组织建立了 72 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 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2014 年 12 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列为 2014 年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成果之一。<sup>②</sup> 日本、东盟、韩国以及美国等其他国家和组织, 都在积极与域内外国家寻求建立和提升伙伴关系。日本已与澳大利亚 (1995)、中国 (1998)、韩国 (1998)、印度 (2000)、菲律宾 (2006)、印度尼西亚 (2006)、越南 (2007)、东盟 (2005) 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伙伴关系。作为整体的东盟, 已与中国 (2003)、韩国 (2004)、印度 (2004)、美国 (2005)、日本 (2005)、俄罗斯 (2005)、澳大利亚 (2007) 等国建立了伙伴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 作为东亚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在冷战后除了继续保持与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同盟关系外, 还与中国 (1997)、新加坡 (2003)、印度 (2010)、印度尼西亚 (2010)、越南 (2013)、马来西亚 (2014) 等国家新建了伙伴关系。除此之外, 美国还与日本 (1992)、韩国 (2005) 等国在保持同盟关系的基础上, 新确立了伙伴关系合作框架。

当前除了朝鲜, 东亚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域内、外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多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相互交叉, 连成了一个伙伴关系网。如果用一张图标注出来, 东亚国家间伙伴关系网已经形成了一个“意大利面条碗”。当然, 根据国家间关系紧密程度和重要性的差异, 这些伙伴关系被冠以不同名称, 诸如“全球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等等。双方还会根据关系的成熟程度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动态调整伙伴关系的类型, 甚至自然消亡。例如, 中巴伙伴关系经过多年发展, 已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

<sup>①</sup> Tinh Le, “Vietnam’s Prime Minister Speaks at Shangri-La 2013”, *The Diplomat: ASEAN Beat*, June 5, 2013, <https://ssrn.com/abstract=2284004>.

<sup>②</sup> 王毅:《盘点 2014: 中国外交丰收之年》,《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1 期。

伙伴关系”；中俄伙伴关系也从最初的“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中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确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最近重新确立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框架。

作为国家间持续良性互动的结果，东亚伙伴关系网呈现出的一些特征值得关注。第一，相比冷战时期东亚涌现出大量同盟关系，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则迎来了伙伴关系的高峰。伙伴关系不仅出现在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比如中国与韩国 1998 年建立了“面向 21 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且美国与一些盟友在保持同盟关系的基础上，也新建立了伙伴关系。比如，美日在保留同盟关系的同时，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成了东亚国家的重要外交战略工具。

第二，在伙伴关系的分布上，东亚的国家往往同时与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建立伙伴关系。比如，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同时与中、美、日等国都建立了伙伴关系。而且，美国的一些盟友诸如韩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国，也与中国建立和发展了伙伴关系。

第三，作为界定国家间关系性质的机制，伙伴关系往往还被“嵌入”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之中，从而衍生出复杂的国家间关系网络。在双边关系上，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并存。东亚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嵌套”着大量伙伴关系。更进一步的，双边伙伴关系往往是多边区域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例如，东盟就明确将是否具有实质性外交关系作为加入东亚峰会成员的条件之一，是否具有“实质性”外交关系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是不是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东亚峰会所有成员国都与东盟建立了伙伴关系。类似的，东盟+3 合作机制中“嵌套”着 3 个东盟+1 伙伴关系。此外，在东亚次地区多边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跨地区的孟中印缅甸经济走廊等多边机制中，同样“嵌套”着大量伙伴关系。

用“伙伴关系”来界定双边关系的做法，始于 1990 年美国 and 苏联在协调欧洲安全问题上的谈判。<sup>①</sup> 美国希望与苏联在欧洲安全问题

<sup>①</sup> Sean Kay, “What i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47, No. 3, May 2000, pp. 15 - 24.

上建立一种双边协调机制，以管控分歧。这种新机制既不同于具有明确权利义务约定的同盟关系，也不是松散的外交互动，而是具有指导国家间关系的框架和原则。这种关系被冠以“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初期，伙伴关系迎来了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缔结伙伴关系的行为主要发生在欧亚大国间，既包括了中俄、中美、中法等国在冷战结束初期缺乏指导两国关系原则和框架的国家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也包括了美国与盟友日本、韩国等在保留同盟关系框架下新确立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扩散的第二个高峰，始于21世纪初。2003年在中国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后，同年日本和韩国分别与东盟建立了伙伴关系。此后，东亚国家间掀起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小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东亚，其他地区并没有出现伙伴关系大幅扩散的现象，而是代之以区域一体化的扩展和深化。欧洲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即实现了从关税联盟—货币联盟—政治、经济和外交高度一体化的区域性组织。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中东甚至非洲地区也进入了一体化的快车道。在区域一体化的水平方面，东亚已经远远地落后了。

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和地区局势产生的冲击，显然是东亚伙伴关系网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的突然结束给东亚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许多国家无所适从。东亚领导人开始频繁地用诸如“不确定”“不稳定”“动荡”等词语来描述外部战略环境。1995年7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盟领导人大会上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惊喜和不确定的世界”。3个月之后的1995年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上，马哈蒂尔再一次强调其对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判断，认为国际环境“陷入了不确定的古老状态”。1997年，越南外交部长阮孟琴认为国际环境正经历“快速的变迁”，在这种环境中“遍地都是导致不稳定的因素”。<sup>①</sup>类似的，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用“大动荡”来描述冷战结束之后的不确定环境，并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分化组合，

<sup>①</sup> Khong Yuen Foong, “Coping with Strateg Uncertainty”, in Suh, Peter Katzenstein and Allen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75.

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sup>①</sup>

与政界人士关于东亚充满不确定性的判断相印证，学界对后冷战时代东亚将“向何处去”也得出了相互矛盾、莫衷一是的预测。现实主义学者将分析重点放在传统军事安全威胁上。他们指出，随着苏联从东亚撤退，美国留在东亚的意愿降低，从而使东亚出现“权力真空”。届时，日本将重新军事化，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强之后开始争夺地区霸权，东亚进入白热化的军备竞赛……总之，“欧洲过去正是亚洲的未来”。<sup>②</sup>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者对东亚的未来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上一体化的深入和互动关系的增多，将推动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出现。<sup>③</sup>也有学者从东亚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出发，预测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朝贡体系”。<sup>④</sup>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伙伴关系在处于十字路口的东亚找到了土壤落地生根，并迅速发展壮大。与同盟、国际制度等框架下的互动关系模式相比，伙伴关系无疑是新事物。刘江永将国家间建立伙伴关系的热潮称之为“国际关系伙伴化”，并认为这一新型互动形式将引发新国际秩序的产生。<sup>⑤</sup>李义虎则进一步指出，国际关系伙伴化现象“说

①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

② Aaron L. Friedberg, “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Survival*, Vol. 42, No. 3, December 2000, pp. 147–159;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94, pp. 5–33; 更多观点参考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94, pp. 34–77; G. Segal, “The Coming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0, No. 2, Summer 1993, pp. 27–32; Ross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18–32.

③ [加]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④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 刘江永：《国际关系伙伴化及其面临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4期。

明国际关系的内容和样式正在发生翻新变化，并且毫无疑问具有某种国际社会结构性改革的意义”<sup>①</sup>。为何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国家涌现出了大量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究竟在一国外交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又将如何影响国家间关系？区域和全球政治的走向如何？尚需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 第二节 本书的主题

本书以东亚国家的伙伴关系战略为研究对象，围绕后冷战时代东亚伙伴关系网产生的背景、主要国家伙伴关系网的构建战略及其对国际政治的潜在影响等议题展开，涵盖以下三大内容。

其一，伙伴关系网形成的国际、地区环境，及其背后蕴含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等深层次要素的变革趋势。伙伴关系是冷战结束之后才出现的新事物，东亚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更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才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学界、政策界都在关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变化。吉尔平在探讨国际政治中的变革时，将国际体系的变革分为三种类型：体系变更，即行为体的性质（诸如帝国、民族国家，等等）；系统性变化，即对体系的统治；互动的变化（国家间作用过程）。<sup>②</sup>毫无疑问，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中战略伙伴关系这种互动形式的大量出现，正反映了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变化”。这种互动形式的变化同样还隐藏着秦亚青教授所指的“体系内部要素转型”的元素。<sup>③</sup>因此，对伙伴关系网络的考察，为我们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

① 李义虎：《论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70 页。

②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秦亚青教授从“体系本体”和“体系要素”两个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转型，认为“体系要素”包括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三个方面。战略伙伴关系无疑体现了一种国家间新的互动形式，大量战略伙伴关系的出现，肯定会对体系文化、体系制度等要素产生影响。从这一视角而言，对战略伙伴关系的研究，对于分析国际体系转型的趋势就具有了重要意义。参见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 年第 1 期。